

「大民國史」的 探索——第一屆 中華民國史青年 論壇述評

李志毓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史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史學研究中的新興學科，也是當代中國史學研究中最富朝氣、最具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為了推進民國史研究，搭建交流平臺，扶助青年學者成長，鼓勵青年人才脫穎而出，形成民國史代有傳承的研究隊伍，2016年8月27-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舉辦了「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71位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日本、美國等國家、地區的學者參加了論壇，52位學者提交論文並報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們多為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青年學者，思想活躍，視野寬闊，論文寫作嚴謹紮實，顯示出較高的學術水準和嚴格的學術訓練，展現出青年一代民國史研究者的整體風貌。

論壇宣導「大民國史」研究，力圖打破習以為常的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等人為設定的學科領域，希望形成跨領域的對話，從整體、綜合的視野，探討民國時期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問題，思考民國史研究的路徑、方法。論壇充分貫徹了這一宗旨，與會論文涵蓋民國時期政治、軍事、外交、思想、社會、文化、學術及文學等各個研究領域。學者們圍繞中共在抗戰中的生存與發展，國民黨的政權建設與政治思想，國民政府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民國時期的城市空間、土地利用、地權管理、鄉村建設，以及重要的政治人物、學術思想等多方面的議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論壇還邀請了一些

在民國史研究領域已享有盛譽的專家學者，以論文評議或圓桌討論的形式參加論壇，對青年學者起到良好的點撥和示範作用，展現出民國史學科既有的學術積累、優秀成果和反思精神。

一、「大民國史」概念的提出與實踐

中國大陸史學界對民國史的界定，通常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時代。在這短短的38年中，中國經歷了空前殘酷的民族戰爭和國內戰爭，在戰爭中實現了國家政權的交替；整個東亞以戰爭的形式發生密切關聯，迸發出種種政治上的可能；各種國際力量縱橫交織，中國既成為世界強權爭奪利益的戰場，也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活躍的舞臺。近代中國社會一切結構性的矛盾和歷史力量都在這裏展開交鋒。最終，一個古老衰敗的文明浴火重生，中國從分裂走向重新統一，整個世界體系也隨之發生深刻改變。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由於在文化斷裂的時代，直接面對中國文明在現代世界中的生存、發展問題，迫切思考、回應中國文化價值與個人生命意義的問題，因此也顯得異彩紛呈。這樣一段廣闊而又深刻的歷史，若能深入全面研究，應可為今天的現實認識提供許多借鑒，也可極大擴充研究者的個人生命感受與人生體驗。

然而，在今天史學研究日益向精深化、專業化發展的同時，也出現研究者視野受到侷限，研究領域日趨狹窄，各領域之間缺少對話的弊端。若青年學者從學術起步階段，就侷限在專業化研究領域中來思考問題，研究政治史的學者不關注經濟史，研究學術史的學者不關心政治史，恐將不利於形成整體性的視野，全面、深入的進入歷史，充分領會民國史研究的意義。因此，本屆論壇特別提出「大民國史」概念。在徵文選拔過程中，既以論文的精深、創新、專業化程度高為首選標準，又考慮到研究者選題視野的寬廣，研究角度的新穎，分科分布的多元、均衡，以及各學科之間的交流、對話。與大多數學術會議集中於某一特定議題或領域相比，本屆論壇在「大民國史」思想的指導下，議題涵蓋了民國時期各個領域的許多重大問題。一些論文儘管從寫作角度而言並不成熟，但若扣住了某些重大問題，可使讀者以此為線索，推進對這些問題的研討與思考，即被認為有其意義與貢獻。

例如，在清末民初，帝制瓦解、共和肇造過程中，如何重建中央與地方關係，是重要的政治議題。江南大學學者陳明的〈熊希齡內閣時期的廢省籌議〉一文，通過研究民國初年北京政府的府、院之間和地方實力派對於省制存廢問題的不同意見及不同的改省方案，展現了民初政界和知識分子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問題的探討。又如，袁世凱稱帝運動，是民國早期政治中的重大事件，而

對日外交則是影響袁世凱帝制運動成敗的一個關鍵性因素。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者承紅磊在〈袁世凱帝制運動時期的對日策略〉一文中，利用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英國外交檔案、美國外交檔等資料，對袁世凱帝制運動的整個過程中，日本政府的態度轉變和袁政府相應的交涉方針變化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展現了外交與內政的互動關係。湖南師範大學學者段煉的〈國之內外的「文野之辯」——以 20 世紀初楊度的世界觀念為中心（1902-1911）〉一文，深入探討了支持袁世凱帝制運動的士人楊度對於國家政治的理解，呈現出清末民初士人對世界格局、現代文明，及中國國家轉型道路的思考。楊度認為，所謂的現代世界體系，是一個「對於內則皆文明，對於外則皆野蠻」的殖民體系。如何在全球競爭的時代，為中國的獨立、安全、富強，建立一套卓有成效的生存策略，重建中國文明的生存理據，這是楊度一生思考經濟、政治、外交、族群問題的起點和歸宿。楊度對於國權、民權、國民與國家關係的探討，包括他在政治上的選擇，都應放在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中去理解。將思想與政局結合起來觀察，加深了我們對民國初年歷史進程的認識。

二、新觀點、新領域、新視角的湧現

青年人思維活躍，有朝氣、有創新精

神，理應有勇氣研究那些決定了現代中國命運、影響了歷史進程的重大問題，並在這些問題上提出新的見解。中共黨史研究近年來成為大陸學者廣泛關注的領域，在本屆論壇中，也可看到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新進展、新觀點。例如，抗日戰爭為中共提供了生存和發展壯大的契機，在抗日根據地生存環境惡劣，日軍掃蕩嚴酷，群眾畏懼逃避徵兵等種種不利條件下，中共軍隊卻平穩實現迅猛增長，從抗戰初期的不足 6 萬哀兵，發展為百萬雄師。到國共內戰爆發前，中共軍隊總數已達到 127 萬人，其中野戰軍 61 萬，地方武裝 66 萬，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華中師範大學學者王龍飛的〈太行根據地的徵兵困境與民兵參軍〉一文研究了這一問題，指出：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艱苦細緻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是由於中共建立起「民兵」這樣一個從「民」到「兵」的兵員訓練、儲備、輸送機制。民兵大量參軍，地方部隊建制升格，使得中共軍隊實現短期內的迅猛增長；而民兵又聯通了民眾與軍隊，使軍隊與社會連為一體。民眾——民兵——地方武裝——正規軍並存而梯級發展的體制，既舒緩了徵兵動員的困難，又確保了兵員的穩定可持續增長，使中共軍隊深深紮根於社會之中。這項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中共在抗戰中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很大幫助。

又如，民主和平等，是紅軍時期開創的、中共軍隊的兩個「神話」。中共中央黨校學者任偉在〈如何平均，怎麼民主？——

紅軍部隊中的資源與權力分配問題探析》一文中，研究了井岡山時期紅軍內部平均主義和民主制度的起源、效用及其蛻變，認為：中共軍隊早期之所以實行澈底的平均主義和官兵平等，更多是一種在極度困境中的生存、發展策略，而並非實行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並且這一過程是極為短暫的。隨著紅軍的發展壯大和生存條件的逐步改善，中共黨內和軍隊內部也出現官僚化、等級化、集權化趨勢。雖然相較於國民黨軍隊，中共軍隊的貧富分化並不嚴重，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制度實踐也一直維護宣導官兵平等，但早期的平均主義和民主體制早已破滅。中共最終的軍事勝利，也不能簡單歸結為實行平均主義和民主制度的結果。再如，1928年國民黨依靠「北伐」和統合各地方實力派，形式上實現了中國的統一，但地方實力派與中央的矛盾及黨內高層派系鬥爭一直是國民黨的痼疾。中共的軍事力量，在長期的游擊戰爭和分散的革命根據地鬥爭中成長起來，山頭林立，派系之爭也是中共軍隊走向統一過程中所面對的嚴重問題，中共是如何解決軍事派系問題的？北京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郭甯的〈115師與山東縱隊：論抗戰時期中共在山東的山頭之爭〉一文，研究了抗戰時山東兩個重要山頭115師和山東縱隊的分別形成和統一過程，進而分析了中共如何實現中央對地方的統一、黨對軍隊的領導。以上三篇論文都對中共黨史中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

與中共黨史研究的廣受關注形成對照，抗日戰爭中的親日政府和淪陷區研究，在中國現代史研究中一直受到冷遇，本屆論壇特別注意到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山東大學學者方豔華的〈「啟動」儒家的路徑：偽滿日與偽的「王道政治」闡釋〉一文，研究偽滿洲國的意識形態及溥儀君臣與日本關東軍對於「王道政治」解釋權的爭奪，這是在中國大陸史學界研究十分薄弱的問題，展現了青年學者的學術勇氣。文章認為，偽滿洲國確立了以「王道政治」為核心的建國理念，但無論是日本軍閥還是滿洲政府都沒有將其看成簡單的復古，而是結合殖民統治的實際，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各取所需的對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溥儀君臣對「王道政治」的解釋，在接榫傳統儒家文化的統治秩序和內聖外王的邏輯上，延續了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說，順帶注入「中日協和」的內容。而當這套王道政治論述不能順暢承載日本人的意圖時，執掌「王道政治」解釋權的關東軍就採取了抑制溥儀君臣的「王道政治」論說的措施，重新規範了「王道政治」的闡釋方向，提煉出攜帶更多軍國主義皇道內容的「建國精神」的概念，作為滿洲國的主導性國家論述，由此也將潛伏在儒家思想中的殖民意圖從幕後轉至臺前，扭轉了此前偽滿洲國正當性資源主要由儒家思想提供的局面。該文雖不夠成熟完善，卻展現出令人欣慰的動向。

青年學者的創新意識，還體現在多元視

角與研究方法的運用。在本屆論壇中，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和實證史學的研究方法仍占據主導地位；但新文化史的視角和方法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地名戰」：上海法租界街路命名的社會文化史〉、〈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一戰時期中國「國恥記憶」的形成與演變〉等論文，反映出青年學者對西方史學思潮的接受與運用。多元視角還表現在，政治史研究從國族視角向地域視角、個人視角的轉換，思想文化史研究從中國視角向東亞視角的轉換，從中心視角向邊緣視角的轉換。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李在全的〈「北伐」前後的微觀體驗——從地域視角釋讀〈黃尊三日記〉〉一文，通過一個居住在北方的普通南方知識分子對「北伐」戰爭的觀察及其在戰爭中的經歷，透視「北伐」戰爭中的政局變遷和社會矛盾，揭示戰爭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展現戰爭中普通人的生活與精神狀態。上海中醫藥大學學者裘陳江的〈孔教會與東亞：〈龍淵金鼎奎日記〉中的孔教會延吉支會〉一文，以韓國被日本吞併後、韓國遺族創辦的孔教會延吉支會為中心，研究獨立復國運動，還原了韓國流亡志士以孔教為號召，以孔教會為紐帶，求生存、謀復國的歷史，揭示了中韓之間在歷史文化與政治現實中一衣帶水的關聯。華東師範大學學者瞿駿的論文〈新文化運動的「下行」——以江浙地區地方讀書人的反應為中心〉，討論新文化運動與江浙地方讀書人的聯交互

動，研究了新文化運動如何從中心城市向各個地方傳播，如何衝擊、塑造了地方讀書人的觀念，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世界和群體認同，影響了他們的人際網路和社會流動。這些論文都拓寬了讀者的視野，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認識。

三、兩岸互動與國際交流

本屆論壇的一大亮點，是來自臺灣、香港、日本、美國等國家、地區青年學者的熱情參與。來自不同地域的學者，表現出不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特點，並能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充分研討，形成真正的交流。特別是9位來自臺灣的學者和5位來自日本的學者所提交的論文，為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拓展視野、瞭解海外同仁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機。臺灣學者多善於運用豐富詳實的歷史資料，由一個小問題切入歷史，呈現出大的時代變遷，例如王文隆的〈中國參戰與國民外交後援會（1917-1919）〉一文，通過研究1917年2月和1919年2月在北京與廣州成立的兩個分別支持北京政府與南方國民黨政權的同名團體——「國民外交後援會」，對比他們人員構成與政治訴求的異同，揭示了在民國初年興盛一時的「國民外交」思想與運動所反映出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知識分子「外交救國」的理想，以及人民參與國家政治、維護國家主權的願望。黃文德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抗戰初期書刊

國際交換〉一文，以中央圖書館和戰時圖書徵集委員會為中心，研究國民政府戰時出版品國際交換體制的形成和運作，反映出抗日戰爭中日軍對中國文化和教育資源的蓄意摧殘，以及國民政府保護、傳承文化，保護大後方高等教育的努力。戰爭一方面對國民經濟和文化教育造成嚴重破壞，另一方面，也會促進科技或與戰爭相關的建設事業的發展。臺灣師範大學青年學者劉芳瑜的論文〈1940年代的中央氣象局〉，通過1940年代氣象臺站的設置與氣象情報網絡的建立，介紹了中國氣象事業在戰時的發展，及軍事需求與民用事業建設的關係。這些論文都以具體問題切入，呈現大的時代矛盾，給與會學者留下深刻印象。

相對於大陸學者對中共在抗戰中的生存與發展的關注，臺灣學者則對國民黨的軍事力量、政權建設、政治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細緻的探討。楊善堯的〈抗戰時期的後勤兵站與傷兵運輸〉一文，不從正面戰場，而從後勤補給的角度研究抗日戰爭，援引大量重要史料，研究國軍後勤兵站的建設及其在戰爭中的作用，探討戰時後勤體系與軍令、軍政各部分的關係，為人們理解國軍如何能以遠遜於日本的裝備，堅持一場持續了8年的龐大消耗性戰爭，提供了新穎的視角，也有助於大陸學者更加深刻的瞭解國軍抗戰的歷史。張智瑋的〈縣制改革與現代國家建構：以抗戰時期的新縣制為例〉一文，通過討論1940年國民政府的縣制改革，探

討國民黨的國家政權建設。認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的巨大軍事壓力下大幅推進縣制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強國民黨基層統治，強化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動員，並以現代化官僚行政體制取代傳統地方士紳在鄉村的統治。雖然在推行過程中，面臨了財政、人力資源匱乏等各種困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蕭李居的〈通往「民主」之路：蔣介石的〈五五憲草〉指示與憲政的認識〉一文，系統考察了蔣介石的民主憲政思想，認為蔣能夠認識到民權的基本原理是人民的自治與自由發展，但其自由平等觀念帶有鮮明的國家主義傾向；蔣也知道議會政治與權力分立的理論，但並不真正瞭解西方政治學理論關於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意義和內涵，也不會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鑒於蔣在國民黨中的長期領袖地位，這一研究對於理解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政治形態，具有重要意義。

與會的日本學者，也帶來一些新的研究視野。例如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關智英的〈冀東政府的思想背景——以殷汝耕與池宗墨為中心〉一文，研究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首腦殷汝耕、池宗墨的思想言論和人生軌跡。認為，冀東自治政府是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日本占領區建立傀儡政權的先驅，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無限制的親日或迎合日本。他的領導人殷汝耕的思想和行為，代表了身處中日夾縫中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所能抵達的限度。殷既指出中日合作的重要性，也指出

為了實現合作，日本人必須改變專橫態度，去瞭解中國和中國人。如果日本在中國所能依靠的僅僅是舊式官僚或軍人，而非真正代表中國利益的民間勢力和作為中堅力量的青年人，日本就無法真正支配中國。而以實業家著稱的冀東自治政府秘書長池宗墨則是該政權實質上的領導。對於冀東自治政府思想背景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探明日本占領地的真實狀況，也有助於加深抗戰時期中日雙方處境的理解。中國大陸學者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非常薄弱，該論文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東亞學者通常比較注重實證研究，而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則思維比較靈活，強調提出不同的問題。本次論壇也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美國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助理教授賀祥（Joshua Hill）的〈民國初期「攜帶武器之權」思想研究〉一文，提供了觀察民國史的獨特視角。作者從美國歷史與美國人民的生活經驗出發，注意到在中國，從清代至今，政府無不嚴格限制或嚴厲禁止民間武器流通，及普通公民持有武器。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間武器問題的討論與更大的政治學或哲學議題無關；對於中國政治、社會問題的討論，也不會包含公民持槍權議題。唯一例外的時期，是1911-1927年。這一時期中央政權孱弱，聯省自治運動蓬勃發展，知識分子積極思考什麼才是「中國式共和」、共和國的公民應有哪些權利等問題。有人提出人民必須有直接自衛

之權，有保護其身體、生命之權，多個省份將人民持有武器權力作為公民權的一部分寫入了省憲法。作者認為，對民間攜帶武器之權的討論，是聯省自治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並且這些條款也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但它表現出民國前期公民權討論所達到的限度，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民國」的含義。

本屆論壇作為首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在民國史研究方興未艾、同時又亟需自我反思與「再出發」的歷史時期召開，彙聚了海峽兩岸民國史的研究人才，整理了民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論壇中產生了许多優秀論文，在此無法全數一一介紹。論壇也搭建了學術交流的平臺，促進了中國大陸各地、海峽兩岸、中日之間，以及整個東亞區域，民國史研究群體的互動。但也鑒於此為「大民國史」概念下的首次論壇，學者們對於跨領域、大視野下的學術交流尚不熟悉，一些議題較集中、專業性較強的論文，無法引起多數學者的共鳴。雖有不少學者表示，對於能與不同學科的同行交流感到欣喜，但多數學者有意願瞭解並能展開深入交流的，仍是自己研究或熟悉的領域。主辦方希望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可以持續舉辦下去，促進東亞、北美乃至更大範圍內青年學者之間更廣泛的交流，通過這一平臺，啟動思路、打開視野，為進一步深化中華民國史研究，從各方面反思近代中國走過曲折歷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